

# 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 深刻把握严峻挑战下

□ 袁维海

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聚人心、暖人心、得人心的扎实工作,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伟力。

## 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实践作出了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一方面,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应对。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资源,凝聚起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大战略成果。另一方面,制度和治理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这要求我们必须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健全各方面制度,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我们要在坚定“四个自信”的基础上,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发挥出攻坚克难、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能量,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

## 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危和机总是同生共存的,克服了危就是机。2020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战“疫”、战“贫”、战“洪”,努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面对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党中央主动调整发展战略,创造性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不是被迫之举和权宜之计。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了重大工作部署。做好2021年经济工作,必须围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来展开,尤其要在一些关键点上发力见效,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通过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只要我们站位全局、立足实际,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因时因势施策,善于从眼前的危机、眼前的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只要我们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就一定能够在抗击大风险中创造出大机遇,确保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 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近年来,我国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取得了历史性、整体性、系统性的重大进步,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我国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首先,要明确主攻方向。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功夫。其次,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政府职能,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为创新创造者营造良好环境、搞好相关服务。再次,要抓好科技创新主体。既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推动科研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更要用好生力军,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只要我们秉持科学精神、把握科学规律、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就一定能够破除各种瓶颈制约,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大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 加入CPTPP:推动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

□ 马相东 王跃生

岁末年初,虽然天气严寒,疫情在全球继续扩散,在中国也有局部反弹,但中国经济和对外开放领域却仍然是暖风劲吹、亮点频出。先是中国与周边国家正式签署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宣告达成;继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于年末最终完成,历经7年的漫长历程终于修成正果。与此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要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一时间成为坊间热议的焦点,掀起了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新浪潮。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定是在充分消化、吸收每一轮改革开放政策的成果、在每一轮开放政策的效应释放殆尽、政策张力趋于衰减的时候,适时开启新的进程,使新的改革开放举措既开疆破土、除旧布新,又因应时势、水道渠成。当然,任何改革开放政策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政策既是对相关产业、行业、企业的挑战,又是对既有利益格局和的制度规则的深刻调整。如同RCEP从2012年11月开始历经8年才完成谈判,中欧投资协定则走过7年35轮谈判历程一样,中国加入CPTPP想必不会一帆风顺,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当然,我们也相信,经历了RCEP的8年谈判的经验积累,特别是经过中欧投资协定这一高水平经贸安排与欧盟27个成员国达成一致 的锤炼,加入CPTPP的过程应当会相对顺利。

不妨从CPTPP的历史、内容与原则、中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等角度观察中国加入CPTPP的前景及影响。

首先,从CPTPP的历史看。众所周知,CPTPP的前身是美国主导的TPP,更早期可以追溯到2005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文莱4国建立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SEP)。美国热衷于主导和推进TPP谈判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其目的之一是主导21世纪的全球经贸规则制定(这从美国同时力推TTP和TTIP两大谈判以建立全球经贸规则的情

况可以看出),二是以高标准的严苛规则排斥中国加入、制约中国发展。然而,特朗普执政后的第一天就宣布退出TPP,使这一刚刚达成的协议险些夭折。在日本等国的主导下,美国退出后的剩余11国对TPP协议加以修改,以CPTPP的名称使之得以存在。如果说TPP的要义是美国主导、限制中国,那么CPTPP的指向则是经济全球化时代高水平的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与市场开放。CPTPP的现有成员国都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贸关系,大多数还都与中国同属RCEP成员国,一般都不反对中国加入。事实上,一旦中国加入,CPTPP的体量将从目前成员国GDP占世界GDP的13%猛增到30%以上,大大增强CPTPP的影响力。只要中国加入的条件适当,这些国家当然会乐见其成。

其次,我们着重分析一下CPTPP的内容和原则,由此观察中国加入CPTPP的难点、障碍与前景。

CPTPP和TPP一样,都被认为是第二代高标准FTA(自由贸易协定)的模板,涉及关税减让、贸易便利化、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透明度等方面。CPTPP协议的结构也与TPP完全一样,都是30章,超过RCEP协议20章的范围,也超过美国既往与亚太国家签订的FTA一般包括23或24章的范围。这些增加的章节,都是传统自由贸易协定较少涉及的所谓“边境后”规则,诸如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政策、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政策、监管一致性、透明度和反腐败等等。不过,CPTPP在保留TPP全部章节、内容和结构的基础上还是做了不少修改,一共22项条款被暂停或搁置,这些暂停和搁置的内容包括:海关监管和贸易便利化条款、投资条款、服务贸易条款、金融服务条款、电信服务条款、政府采购条款、知识产权条款、环境条款、透明度与反腐败条款。这些条款都是美国最为强调而在其他国家充满争议的部分。正是这些修改,使CPTPP的内容在高水平贸易投资自由化原则之下,降低了相关要求的强度,缩减了所涉及

的领域与范围,增加了条款的弹性,使各国都能接受并较快达成一致。

不过,尽管CPTPP搁置了TPP的少部分条款,但CPTPP仍然是一个高水平的自贸协定,对于我国现有经济体制和现行贸易投资规则仍有不少挑战。从CPTPP现有条款看,一般认为,我国在纺织服装、原产地规则、海关管理和贸易便利化、贸易救济、发展、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基本能够接受CPTPP的条款;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投资、金融服务、政府采购、环境、中小企业、透明度与反腐败等方面虽有障碍但接受起来难度并不太大;而在货物的国民待遇与市场准入、跨境服务贸易、电信服务、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劳工、监管的一致性、国有企业与指定垄断等方面则与我国现行制度规则差异较大,有较大的接受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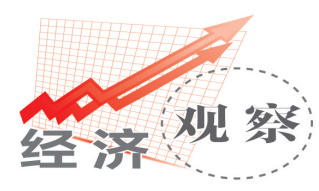
当然,必须注意到,在过去几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下,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下全球面临断崖式滑落的背景之下,中国大大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自贸试验区大幅度扩容、RCEP的成功签署,以及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如期完成,都是中国积极推动的结果,也是由于中国在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国企竞争中性等方面作出较大让步的结果。经过这些大幅度开放的洗礼,中国应对CPTPP挑战的能力自然显著增强。何况,上述领域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本来就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不可回避的课题,也是我国构建该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再次,中国积极争取加入CPTPP的意义还应当放到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背景下看待。

从国际环境来看,如已指出,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大幅度萎缩停滞,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脱钩”、“断链”与孤立主义潮流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各国的经济发展,2020年全球贸易投资规模出现了断崖式跳水。尽管美国将会重新加入一些国际协定,重新申请回到CPTPP也未

可知。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大国博弈大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博弈仍会继续,全球一体化结构和多边贸易体制短期内很难取得大的突破。无论如何,在此种背景下,排他性的双边、多边、区域、跨区域的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安排将是未来的主流趋势。CPTPP作为一个涉及地域广泛(英国等亚太域外国家也都在申请加入)、经济体量巨大、涵盖21世纪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安排,肯定会成为主导这种趋势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核心成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应该加入其间。

再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中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经济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艰巨任务。在经济全球化受挫、外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党中央及时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走向更高水平、制度型、规则型对外开放则是必备条件。譬如,随着国内大循环的推进,我国在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以及最终产品市场上会逐步摆脱对发达国家的单向依赖,在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内需市场方面不断取得进展,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独立掌握所有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生产,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说在这些方面形成有领先、各有所长、互有需求的局面,最终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对等、竞合、互惠的可持续发展的对外合作格局。这就特别需要在市场准入、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与外部世界规则相容、互利合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加入CPTPP之类的高水平国际经贸自由化安排,将有利于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与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 李 婧

百分点;2019年我国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8.1%,扭转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尽管如此,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绿色低碳化程度仍有待加深。一是生产环节亟待由数量优先、速度优先的粗放型生产向质量优先、生态优先的绿色生产转化。二是现有流通体系对绿色低碳循环经济的支撑能力仍显不足,流通环节存在资源消耗较多等问题。2019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为14.7%,高于全球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左右。三是绿色消费的潜力尚待挖掘,能源消费的结构变革和生活消费的绿色转型均需进一步推动。因此,应从三方面着力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深化产业结构改革,推动绿色低碳生产。一是优先使用绿色低碳能源,积极推进风电、水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生产与使用,提供环保高效的生产资料。二是鼓励绿色低碳技术创新,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重点突破关键性和全局性技术,解决好高精尖的核心问题,强化高质量生产与高水平保护的技术支撑。三是采用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吸引绿色投资,加快企业战略转型和技术升级换代,降低企业对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生产方式的路径依赖,实现质量优先、生态优先的绿

色生产。四是鼓励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大力支持低耗能、低污染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清洁化、可持续化改造,实现高质量生产与高水平保护的良性互动。

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推动绿色低碳流通。一是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绿色商流,加强电子商务平台的建设,通过加快信息流通,减少交易环节,实现产销高效对接。二是建立少损耗、多保护的绿色物流,依托“互联网+”的智慧流通方式,计算最优运输路径,采用环保运输包装,做好回收再利用工作,降低流通成本及资源损耗。三是建立环境友好、便捷高效的国内流通体系,优先发展节能环保的高铁等运输方式,升级改造高耗能的运输及储藏设施,健全完善污水处理、垃圾分类等处理措施,协同推进流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与自然环境的高水平保护。四是建立绿色发展、普惠共享的国际流通体系,依托“一带一路”等,发挥我国全球最大清洁能源制造国的优势,畅通低碳商品的采购和销售,推进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联通,在世界范围内促进绿色资源的高效流通与优化配置。

培育理性消费观念,推动绿色低碳消费。一是推动消费意识

的绿色转型,采用多渠道、多元、多媒介的宣传方式,普及节能环保的消费理念,营造绿色消费的社会氛围。二是推进能源消费的结构变革,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差别价格机制,推广重要低碳节能技术,引进绿色环保设备,提高能源运输效率,进而开拓清洁能源消费潜力。三是引导生活消费的绿色转型,通过加强激励措施和增强约束条件,推动形成以环保选购、循环利用、节约资源为核心的生活消费体系,缓解资源浪费和污染治理压力。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需有机联动绿色生产、绿色流通及绿色消费的各个环节,协同实现环境保护、节能减排、资源高效利用的多重目标,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考量,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之路。

